

# Opinion · column

## Forum

### 上证论坛

从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来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可能在明年凸显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在手段上,将更多利用“调结构”来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而“调结构”也包含了有关民生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总之,既要考虑保增长的前提,又将考虑消除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以更加富有弹性的调控政策应对未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

# 明年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高于防通胀

◎赵晓 岳安时

相信很少有人预料到,2009年的中国经济会有如此强劲的复苏。商人们在庆幸之时,亦大感市场之变幻莫测。其实,难测的不是市场看不见的,而是政府看得见的。2009年,中国政府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方向、力度和效果,在事先可谓事事难测,但无疑又是2009年中国经济V形反转的最重要推手。但商人们有学习的能力,错过2009,不容错过2010,明年的中央政策的走向因此格外受到各方关注。在2009年末,首先要关注的,是来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信息。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

正是国际经济形势表现出多重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时候。例如,近日爆发的迪拜债务危机令全球股市重挫,上证A股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刚刚复苏的全球股市以及中国经济似乎再次面临巨大冲击,这无疑让原本较为乐观的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平添一道阴影。如何巩固扩大内需所取得的成果,平稳渡过此轮危机,让国内经济保持稳健复苏势头,并切实解决一年以来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经济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人们也因此更期待来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声音。

而近期外界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有几次争议,比如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应继续

以及中央对于通胀预期的重视程度究竟如何,已渐趋明朗。政府官员曾多次公开表示宏观经济政策将会持续,且诸多经济学家对此持相同观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强调了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2010年要落实和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提高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可以说,这些简短信息已足以打消了外界的争议与疑虑。

首先,明年经济政策的基调将不会改变,仍然将会以扩张性政策为主。财政方面,2009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取得了极大成功,2010年还有将近6000亿元的中央政府财政投资,将带动全社会投资增加约2万亿元。此外,发改委更传出明年财政赤字将达万亿的积极消息。很显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再加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作为余下的政府投资“保驾护航”,使其切实发挥出最大效力。

其次,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虽然面对通胀压力以及已经明显开始出现的通胀预期,但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结构的平衡性、流动性、充分就业等问题还未能较好地解决,因此政府最终权衡的结果是,“发展论”重于“物价论”,货币政策仍将以前刺激经济增长、保持经济持续稳定作为第一目标。相反,此时如果因物价风险而收紧货币政策,将使刚刚企稳的经济陷入风险,甚至导致政策、调控成果付诸东流,可谓是一种更大的风险。预期明年的经济发展,信贷规模仍将左右着经济发展大势,而信贷规模主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取向,目前有关信贷规模的主流估计是,全年新增贷款7至9万亿元之间,信贷增速约17%,应该说可能性较大。同时,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与规划

已出台,将进一步优化民间资本投资。调整部分行业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等政策效应也会在明年持续显现。据预测,明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将达31%左右,大约拉动GDP增长超过5.0%。

通胀预期及防范是外界争论最多的话题。目前,世界各国救市、刺激经济投入的数万亿美元将从金融部门流向实体经济,形成全球性通胀压力,且大量新增信贷从金融体系逐步流入实体经济,推动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并将最终传导到终端消费市场。政策如果出现失误,未来通胀就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此次对于通胀的态度是审慎的,从10月起就已抑制通胀已摆上了议程,流动性和资产泡沫等问题也已引起高度重视。但综观全局,特别是从保持当前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复苏来说,笔者认为,此时不宜将通胀预期列为宏观调控重点。因为对通胀的调控势必会紧缩货币,下一步的经济刺激计划因此将大打折扣,有碍于中央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本要求。照目前的趋势看,明年中国的通胀率约在2.5%左右,应该说仍是温和水平,可通过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微调,给予化解,而不必马上改弦易辙。

毫无疑问,从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来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可能在明年凸显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而在手段方面,将更多地利用“调结构”来稳定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而“调结构”并非单纯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包含了有关民生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等等,既要考虑保增长的前提,又将考虑消除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以更加富有弹性的调控政策应对未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

(作者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岳安时系该校硕士研究生)

## 新减排计划带给企业新压力新空间

◎周子勤

在距离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还有10天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相继给出各自的减排目标。最吸引眼球的,是美国宣布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中国则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至45%。

气候变化已成当今全球最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气候变化合作迫在眉睫。而作为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企业不仅要关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政策变化、突发气候事件、企业声誉及法律风险,更要关注由此带来的创新机会,比如低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产业的开发。

减排对人类社会的真正挑战是,以同样数量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新的减排目标肯定将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增加企业负担。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面临减排巨大的国际压力以及欧美等国正在酝酿推动碳税等财政政策的背景下,如何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和日常管理活动,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大计。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对气候变化问题还缺乏清晰、完整的认识,采取应对气候变化具体行动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新的减排背景下,我国企业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这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转型机遇。中国要做的,就是要提高单位碳排放的生产率,这就需要新技术、新工艺、新生产方法、新运行机制,乃至新的制度安排。我们可以看到,从国家实施节能减排计划以来,包括技术资金在内的大量资源已投入到减排领域,技术进步的速度由此显著加快。比如近年来光伏发电的成本,由于技术进步而迅速降低。此外,减排也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形成全新的产业领域,并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比

如电动汽车等等。

提高碳排放生产率,将改变已有的竞争优势和资源配置格局,在碳排放总量受限且可交易的条件下,实际碳排放将更多地流向碳排放生产率高的地区和企业倾斜。

据估计,到2012年,全球碳交易将高达1500亿美元,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交易,中国有望占据三成以上份额。我们已在制造业上尝尽“跟随者”的苦头。在节能减排交易中,及早行动树立“中国标准”,尽快建立完善碳自愿减排市场平台,推动碳自愿减排机制的形成,才可能打破我们的被动局面。

为此,我们需要在碳排放上转变观念。可以预见,碳排放生产率高的地区和企业,将赢得新的竞争优势,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而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掀起的低碳发展观念,实是一场国家发展的竞争,这是创新的竞争。有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国家实际上会赢得新的竞争优势。当然,在减排的初期,部分地区和企业可能会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只要技术进步发挥作用,减排成本将逐步降低,也可能出现排放成本更低的情景。这就需要我们在政策和环境上给予创新机制上的扶持。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推出新的减排计划,实际上给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因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所引起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有不少的有利条件,比如节能环保新能源发展的环境,近年来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比如电动汽车,中国有些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了,有些可以说是在全球范围内是领先的,或者有领先的可能。我国的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可以为诸多减排新技术提供商业化、市场化的前提条件。随着近期低碳研究院的设立以及中美之间新能源合作的确立,我国低碳产业带动着我国经济走向“低碳时代”的前景可期。

(作者系安邦咨询助理研究员)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终于为该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角色“道歉”,可是含糊其辞,空洞无物。《纽约时报》社论讽刺说,这其实根本就算不上道歉,毋宁说这是一次公关行动,试图以所谓的低姿态来化解外界敌意。漫画:刘道伟

## ■外论一瞥

### 印度《经济时报》11月27日专栏文章 能源和气候:国家崛起的巨大机会

新技术将使印度能够更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并减少污染、浪费等问题。印度如何才能抓住这一机遇?我们自身的利益如何才能在将下月将要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这样的国际谈判中得以体现?我主张三步走:

第一,利用业已存在的效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并且在这样做时扩大规模,提高速度。简单的政策就能带来变化,印度应采用节能照明标准,如此将带来最终民众和国家双赢的结果。

第二,加快采用清洁技术(例如太阳能)计划的执行。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已成德国和西班牙的主流选择,而印度也有这种预期。因此,印度应尽快建造大规模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厂。

最后,印度应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和之中主导谈判。政府已清晰而正确地提出:印度不能接受减排总量限制,最终人均碳排放量富国穷国必须一视同仁。然而,我们需要做更多,需要找出并致力于对印度自身有利的政策,并作为郑重承诺在全球机制中提出。

面对能源未来,每个国家都处在转折点,然而,我们需要做更多,新技术的迅速应用以及国际论坛的有效利用,印度不仅能够牢固确立其创新者和思想领导者的地位,而且也能够创造可与互联网革命相媲美的能源革命环境。

(作者:网景、亚马逊和谷歌联合创始人拉姆·施瑞拉姆 张金翠编译)

### 《独立报》11月27日评论 迪拜危机促使投资者慎待主权债务

迪拜故事包括两部分,一是其经济发展理念——通过发展为企业贸易和服务中心创造可持续的增长。这是其港口、飞机场、银行办事处、医疗中心等建设的理念支撑。发展为服务中心的决定导致了资产繁荣。但事情发展并不完全在估算之中,耗资不菲的建设使得迪拜对于需求下降的应对极为脆弱。一部分关于金融、以长远角度来看,迪拜的公共财政情况没有问题。迪拜拥有包括颇具规模的财富基金在内的宏大资产。作为整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石油创造的巨额财富,并还将继续累积。但迪拜身陷流动性紧缩,过去一年全球资产处于贬值态势,现在打主的现金流为王。因此压在迪拜身上的金融压力开始不断加大。

过去信用评级机构认为,政府会在政府支持的银行、公司后面,现在看来这种估计过于乐观。人们也想像

过,富庶的迪拜不会违约,拖欠借款,现实证实也是过于乐观了。问题大部分可归结于时机:迪拜债务的结构是短期型,但人们未估到的是债务的到期并不能总是以债偿债。

这场由迪拜开始的有威胁性的违约,将使得投资者仔细审视主权债务。主权债务风险的复杂性在于涉及诸多因素。信用评级机构所用于评估国家财富的标准,对于国家债务的实际规模以及每期未偿增加的债务考虑不全,这里存在一个后视镜问题:机构必须用他们收集到的数据工作,但与此同时,世事变化。尤其涉及国家时,除了考虑国家经济现状,也需要考虑政治意愿。

此次金融危机后期,主要发达国家将身负达GDP100%的债务。主权债务后续发展已引起引人注目的公共议题。

(作者系《独立报》经济评论员人哈米什·麦克唐纳 贺艳燕编译)

### 《金融时报》11月26日评论 20国集团更应成为一个论坛

领导世界经济的G20宣称要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机构,取代浮夸、失却代表性的G8,并为其新组织勾勒了更大权力。主流的公共反应是积极的。毕竟,G20代表了世界经济的85%以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但是G20要自代世界所有国家做出重要金融决定,这本身侵犯了国际合作的根本原则,也削弱了一些小国的主权,以大统小的规则为公正不埋下了伏笔。G20对其成员没有清晰的标准,只要是来自不同大洲的大国都可参加,但大国规模是不确定的。G20也没有管理的商定规则。伦敦峰会上,实质决定仅由主要国家私定而排除了至少一半G20成员的内幕,抱怨诸多。如果政治领导人未有规则约束,来下谋私是很自然的结果。

G20滥用了普遍性原则,破坏了

国家主权原则。G8声称是一个非正式的讨论俱乐部,但却拥有全球金融管制权力。它做出决定而让其他160个国家服从。

最后,G20还是由引起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制定者所组成。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责任自己,而是将矛头指向了避税场所和对冲基金,但这些并不是引发危机的原因。不作出诚实的分析,他们不会改善现状。

将G20定位为超国家力量的经济组织是有违国际法许多重要原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G20缺乏的所有特点——普遍性、章程、法令、管理和人员,应变得更有代表性、权威性和有效性,G20则应成为一个论坛。

(作者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斯·斯兰德 贺艳燕编译)

## ■专栏·主持 沈飞翼

## 迪拜畸形繁荣撑不住了



梅新育

迪拜世界(Dubai World)集团及其下属房地产部门棕榈岛集团(Nakheel,亦译“纳赫勒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而引爆迪拜全面危机,实属必然。迪拜危机是正确与失误混合的经济发展战略所造成的。

鉴于石油财富有耗竭之日,阿联酋中的迪拜酋长国确立了向非石油经济、特别是服务业中心发展的战略。2005年前后,非石油经济增幅高于石油部门10个百分点以上。发展非石油经济,是海湾石油输出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迪拜的转型战略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问题是迪拜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借款投入开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据迪拜政府官员向英国《泰晤士报》披露的财政状况,2008年迪拜政府债务100亿美元,国有企业债务700亿美元,其GDP为1980亿迪拉姆(约合539亿美元),亦即迪拜国有部门债务是其GDP的158%。而根据穆迪最新报告,包括获得评级的5家公司负债,迪拜政府控制的公司其他12种未获评级的负债两部分,迪拜政府背景的公司负债总额达到476.16亿美元,亦即迪拜目前的公开债务是其GDP的1.03倍,在巨额负债投资的推动下,包括建筑业在内房地产业占迪拜经济比重达到了30%,七星级酒店等极尽奢华的建筑闻名世界,房地产价格高涨,但这种建立在高负债基础上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久。到今年初,迪拜房地产市场颓势已再也无法掩盖。

西方需要阿拉伯源源不断提供的能源,为此就需要阿拉伯安分守己呆在西方政治经济框架之内“轻举妄动”;而要消解阿拉伯团结一致对抗西方的风险,维持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各国要么富裕而软弱要么强硬而贫穷的格局对西方最为有利。为此,西方多年来刻意庇护、放纵在其羽翼下的富裕海湾石油输出国,让这些国家及其腐朽的统治集团为了己之私而反对、阻碍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一致,西方则希望这些人只占阿拉伯一小部分的国家能创建一种富裕的生活方式,从而潜移默化地在阿拉伯人头脑中制造出“在西方羽翼下可以获得富裕”的思想意识,给扎在在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陈旧产业结构下的中东人一个虚幻的希望。迪拜和其他海湾酋长们也意识到了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声称不行了,中东对西方将更加危险,因为如果迪拜模式行不通,迪拜将效仿伊朗路线走伊斯兰主义道路,进而将这种影响扩展到整个阿拉伯国家。这样,西方的战略考虑、海湾酋长们和西方银行家们的道德风险相互促进,最终造就了迪拜这样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

除股市的心理传染、贸易停顿等项损失之外,迪拜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首先体现在建筑工程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总体一直是逆差,但建筑服务却一直是服务贸易中最大顺差项目之一。按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共取得168240份合同,合同金额853.4494亿美元,营业额478.9953亿美元,派出人次37.1709万。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亿美元,同比增长35.3%,新签合同额776亿美元,同比增长17.6%。

在中国一些工程承包企业中,特别是名列前茅的工程承包企业中,海外业务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和中国《建筑时报》联合评选出的2008ENR/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60强,2007年度国际项目总收入营业收入之和增长30.3%,远高于国内项目总收入营业收入之和的14.7%的同比增长率,国际项目营业收入总和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从上一年的8.9%上升到了10.0%。

在近年来的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热潮中,包括迪拜在内的阿联酋一跃成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的淘金乐园。2007年,中国企业从阿联酋取得181份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合同,合同额247.9901亿美元,营业额148.3011亿美元。而且,阿联酋项目单项规模较大(意味着技术含量和利润较高),2007年中国企业在全球取得合同平均份合同金额为5073万美元,在亚洲市场平均份合同金额为19259万美元,在阿联酋市场平均份合同金额为1370.11万美元;中国企业在全球取得合同平均营业额28.47亿美元,在亚洲取得合同平均营业额11128万美元,在阿联酋取得合同平均营业额81934万美元。迪拜房地产市场一旦崩溃,中国相关工程承包企业将陷入困境,尽管程度可能不同。

迪拜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同时也体现在资产损失上。在迪拜此前的发展热潮中,一些中国投资者也投身于此,如温州就有商人2007年投资2800万美元买入迪拜人工岛“上海岛”,准备用于房地产开发。如果这些中国投资者的资金来自信贷,他们所造成的风险将进一步放大。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 欧盟各方精妙算计两把金交椅



李俊

“欧盟总统”前些天诞生了。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当选,一度呼声很高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对这一职位的长期追求失败。

英国媒体报道称,尽管“欧盟总统”最初是被视为更重要的职位,但后来大部分注意力转到了“外交大臣”,这个职位对欧盟每年70亿英镑(10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预算具有发言权,并将领导一个5000人的强大欧盟外交使团。

所谓的“欧盟总统”的确切说法,应该是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即为欧盟首脑会议,是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欧盟的主要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和欧洲审计院等。在“欧盟总统”出现以前,欧洲理事会由欧盟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理事会主席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半年,顺序基本按本国语文字书写的国名字母排列。欧盟首脑会议主要负责制订“总的政治指导原则”,其决策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是按照今年11月3日通过的《里斯本条约》设立的。根据职务特点和内容,这两个职务被形象地称为“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

其实,布莱尔在形势已变得很明朗时已退出了竞争。在欧盟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右派领导人决定,这一由《里斯本

条约》设立的职位应该落入他们的集团中。据英国《卫报》报道,欧盟首脑会议即将开始前,在布鲁塞尔一个欧盟日内派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英国首相布朗为了最后助布莱尔一臂之力,开始实施“B计划”。但是,布莱尔并没有得到这个派别的支持,布朗遂把布莱尔的提名撤回,代以提名英国上议院前领导人阿什顿出任高级代表。在英、法、德和其他欧盟国家的政治博弈之后,布莱尔的“隐性弃权”终于使得阿什顿顺利获得了“欧盟外长”职位。

阿什顿曾经担任过副国务大臣,在2007年成为英国上议院领袖,并有参加核裁军运动的经历,但外界许多许多人并不熟悉他。

布莱尔的失利,实际并不让人意外。在英国国内,两个主要在野党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一直公开反对布莱尔出任“欧盟总统”。英国《每日电讯报》此前刊登YouGov机构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布莱尔出任此职的英国选民不足三分之一。另外,欧盟各国也不希望选出的“欧盟总统”是个愿意突出、能力超强的焦点人物,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个能够游刃于各国之间,协调成员国立场和关系的“低调”“总统”,因此出身“小国”反倒成了优势。

再则,许多欧盟国家都对布莱尔坚持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不满。而且,英国至今不通行欧元,也不是申根国,一个要代表欧盟的人物,如果不能从一个使用欧盟的共同货币和加入到免签证旅游区的国家选出,这些欧盟国家是无法接受

的。应该说,伊拉克战争恐将成为布莱尔永远无法甩掉的政治包袱了。11月2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曝光了上百页的英国政府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英国早在2002年初就策划全面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可是在整个2002年,布莱尔在接受议会质询时都表示,英国的目标是解除萨达姆的武装,而不是推翻其政权。此外,在数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布莱尔针对“英国有没有做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时,布莱尔的回答都是清晰的“不”。这些,又给布莱尔未来的政治生涯在全球的影响力又增加了一道阴影。

不过,若是从“赚钱”的角度来说,布莱尔的退出倒是大大有利的。按照欧盟理事会的委员行为规定,公职人员必须放弃一切“有酬或无偿工作”,而有偿演讲是布莱尔利润最丰厚的副业之一,另外,虽然在慈善机构担任名誉职务是允许的,但前提是公职人员“对机构的管理不具有决策权”,定期募资也根本不可能。这样,要有布莱尔真当选,他主导的慈善基金将被迫重组,他代表布莱尔公司为摩根大通和汇丰等金融等提供咨询服务之类的所有商业行为都必须叫停。甚至,对他出版回忆录可能也会有所影响。

可以说,谁出任“欧盟总统”,其实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对于个人,这个职位形同虚设。但围绕这个职位,欧盟各势力却在一系列纷纷扰扰中经历了又一次大较量。

(作者系伦敦欧金投资首席经济学家)